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颜晓峰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深刻阐明了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内涵。新征程上，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现代化进程中机遇和风险并存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纵观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形成和积累不少矛盾与风险。能否形成安全稳定的环境，是各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

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75万亿元跃升至2024年的134.91万亿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50万亿元，累计建成5G基站总数约占全球总量的60%，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成果，为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与机遇相伴而来的也有“暗礁险滩”“风高浪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防控压力较大，这些矛盾和风险躲不开也绕不过。同时，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也随时可能发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国家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不是变轻了，而是更重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指引方向

国家安全观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观念与支撑理论，明确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确立国家安全的价值准则，决定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引导一个国家的安全实践。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确保民族复兴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日益增加，国家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们从过去顺势而上到现在顶风而上，维护安全的难度加大；从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到现在动荡复杂、暗礁潜流增多，对应变能力要求更高；从过去发展水平较低到现在发展水平提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非传统安全如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太空安全等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国家安全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战争制胜权向制太空权、制信息权等演进。这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安全观。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关键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统筹国家安全重大关系，推动国家安全在各领域各方面的全面落实，打好维护国家安全总体战。具体表现为，把握国家安全在世界大势中的总体性，具有谋求国家安全的国际视野；把握国家安全在民族复兴中的总体性，具有谋求国家安全的大局意识；把握国家安全在各个

领域中的总体性，具有谋求国家安全的整体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一个总体”与“十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统一，凝结了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宝贵经验，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具体体现为：保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需求，把握更加宽广丰富的国家安全特征，提供了赢得新的伟大斗争所要求的时代安全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准则，确定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促进发展大局的国家安全道路，提供了保证我国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科学安全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的国家安全治理，统筹多层次多类型多领域国家安全体系，提供了协调运转、互促互进的系统安全观；构建捍卫总体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安全力量，依靠强国强军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提供了大视野大格局的国防安全观。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引领作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矛盾的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涵以及重点内容也在变

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就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要确保二者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就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and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确保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最终实现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

一方面，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各类安全风险与挑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我们才有强大实力和足够的底气解决在发展中面临的创新能力不强、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开放型经济水平不高等问题。例如，面对城乡差距这一问题，只有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才能化解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水平安全对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满足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安全提出的新要求。例如，在科技领域，科技创新是当前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战略支撑作用。只有重视科技安全，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勇于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激烈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事实上，从《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均对服务型制造作出部署，并将其定位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那么，服务型制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服务型制造是指通过增加企业生产经营中服务要素的比重，促使企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从生产、销售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服务”。相较于生产型制造关注产品交付前的生产过程，以“产品”为核心开展经营活动，服务型制造的价值创造从生产环节向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延伸，具有全周期、定制化、知识技术密集等特点，是一种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在实践中已形成定制化服务、总集成总承包服务、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服务 etc。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攀“高”向“新”发展趋势显著。但从整体上看，制造业发展仍面临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不高、绿色转型压力增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等内外部挑战，制造业转型升级需以服务型制造为方向。

其一，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生产型制造主要通过产品生产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差价获得利润，这一获利模式受到物料成本、市场规模、竞争程度等多方因素制约。而服务型制造通过在生产、销售、售后环节中嵌入服务，将生产利润的环节延伸至产品全生命周期，显著提高利润率。同时，服务型制造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具有高度定制化与知识密集型特征，难以被竞争对手低成本模仿，避免企业陷入同质化竞争与价格战。例如，三一重工通过“根云平台”对其售卖至全球客户工程机械的运行状态进行智能管理，提供远程诊断、预测性维护和备件供应等服务，客户设备利用率提高，维修成本降低，用户黏性与企业服务收入随之提升。

其二，显著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服务型制造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原料采购、产品生产、物流运输等各环节，整合产业链供应链资源，实现跨产业、跨产品、跨场景的供给侧贯通与全产业链运营流程优化。利益相关方由单纯的交易关系转向长期、稳定的深度合作关系，形成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产业组织关系也由传统的静态链状模式向动态、灵活、稳定的拓扑结构转变，从而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的抗风险能力和恢复能力。例如，一些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指引，在订单峰值期间将订单自动分配至最优产线，提升产能错峰利用率，实现柔性生产。

其三，利于营造创新生态。服务型制造业务边界的扩展，要求企业整合硬件、软件、数据、服务等多领域技术，倒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开展合作。此外，通过融通制造和服务的一揽子需求，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客户之间的资源和信息共享更加紧密。这不仅使得企业可整合上下游资源，共享信息、平台等创新要素，形成协同创新机制，创新成本与门槛大幅降低；也促使企业能够及时获得产业链上其他环节以及市场反馈，将需求作为产品迭代、服务更新的方向。例如，小米公司构建米家生态链，利用其在智能硬件和互联网服务方面的优势，为一系列专注于开发各类智能硬件产品的创新型初创公司提供品牌、市场、供应链、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支持，降低了中小公司的创新门槛，促进了跨界合作。

其四，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当商业模式由卖产品转向卖“产品+服务”时，出于降低成本提升利润考量，企业会设计更耐用且易于维修的产品，降低资源的消耗与碳排放。服务型制造企业还可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生产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生产计划和物料管理的精准性，优化生产流程，推动设备、技术等共享，减少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

在产业变革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服务型制造正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我国服务型制造起步较晚，一些企业转型意愿与转型后发展水平不高。推动服务型制造的高质量发展，仍需久久为功。一是要加强政策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设立专项资金等手段，支持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打造服务型制造示范标杆，鼓励示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效应，推动产业链整体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二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降低企业转型成本与门槛。推动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设备、数据、业务流程的互联互通，为服务型制造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保障。三是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持续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培养跨制造技术、服务设计、数字化运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数实融合激发消费新动能

陈佳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6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2%。但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且消费结构升级面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服务性消费占比偏低等约束。激发消费新动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重要突破口。

数实融合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数据要素为底层支撑的新型经济范式，通过重构生产逻辑、创新价值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技术、产业、组织层面的系统性耦合。这种深度融合能够突破传统消费市场的时空边界与供给瓶颈，对于提振消费、扩大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服务消费，优化消费结构。当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受制于发展型、服务性消费供给不足，医疗、教育、文娱等高附加值消费占比偏低。数字技术重构服务消费的时空边界与价值创造模式，突破传统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供给约束，将医疗服务等服务转化为可复制、可传输的数字产品，降低扩大高质量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实现发展型消费的供需适配。例如，互联网医疗平台依托AI辅助诊断和5G远程会诊技术，将三甲医院优质资源以低边际成本扩展至县域市场；知识付费平台通过知识图谱与个性化推荐算法，实现教育服务的精准触达，推动消费的提质扩容。这些实践表明，数实融合具有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体验型、智慧型加速跃迁的作用。

整合全国市场，挖掘消费潜力。在传统经济体系中，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与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往往面临市场接入效率较低的问题。而5G网络、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将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整合进统一的数字化市场。同时，也激活了小微企业的市场参与

度，例如，一个直播间就能连接庞大的消费群体，打破地域和渠道限制。这种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消费潜能释放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地理距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在更广泛的市场范围内实现效能的整体优化。

推动信息联通，促进供需匹配。传统模式下，企业往往根据滞后的市场数据制定生产计划，容易造成生产过量却难以满足个性化、品质化需求的情况。数据要素的实时流动打通了信息孤岛，破解了生产端看不见消费者真实需求的难题，推动供给体系从“预测型生产”转向“响应式制造”，以需求精准反馈破解资源错配的问题。实践中，大数据让实体企业能够实时捕捉消费者行为，构建起“需求即时感知—生产灵活调整”的智能系统。此类用数据打通产销通道的模式，将市场需求的“毛细血管”与生产供给的“神经网络”实时联通，实现“卖什么就产什么”的精准匹配，更有助于推动经济系统走向精准化动态均衡。

重塑商业模式，压缩交易成本。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多重因素制约了居民消费意愿的释放，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与门槛也是激活消费动能的可行之策。传统消费链条中，商品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往往要经过多层经销商，推高了价格、降低了速度、拉高了交易成本。数字平台重构商业流通的拓朴结构，压缩传统分销体系的冗余环节，通过降低搜寻成本与契约成本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意愿。例如，电商直播等新业态本质上是对传统分销体系的“去中间化”改造，使厂家与消费者直接对话，既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又让价格更透明实惠。

上述四个方面形成了“供给升级—空间整合—供需对接—成本优化”的协同闭环，有助于在微观层面重塑消费者偏好和消费习惯，在宏观层面推动消费增长动力的结构性优化，最终实现消费市场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规模质效并重。但这一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仍面临技术、制度等因素制约。

具体而言，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

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影响了数据的顺畅流通，抑制了消费新场景的拓展，阻碍了供给端对市场变化的敏捷反应；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仍存在短板，在芯片制造、工业控制系统等基础性技术领域对外依赖度较高，使得消费升级往往停留在应用层改良，难以形成从硬件到服务的系统性突破；数据资源流通壁垒尚未彻底消除，数据归属不清晰、交易规则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致使大量消费场景的创新难以形成规模化应用，阻碍消费服务精准化水平的提升，制约了消费提质扩容的深度与广度。打破上述现实约束，进一步发挥数实融合对提振消费的支撑作用，需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构建全域覆盖、高效协同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数实融合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既需要广域网络连接的全面覆盖，更离不开跨区域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应在实现城乡网络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将分散的算力资源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形成高效算力供给格局。例如，贵州打造的“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为长三角电商平台提供毫秒级响应的云计算支持，极大提升了为消费者推荐商品的精准性。这种信息基础设施的布局升级，本

质上是通过技术普惠破除地域壁垒，让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与都市圈的新消费需求产生连接，让县域工厂的制造能力与全国市场的动态变化保持同步。

二是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攻关体系。当更多企业通过联合创新掌握底层技术话语权，智能终端的产品迭代将不再受制于外部技术周期，消费者也能持续获得更可靠、更具差异化的升级体验，最终形成技术自主与消费升级的双向促进机制。需支持行业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弥合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的断层，由消费端需求倒逼技术突破，既确保了研发方向与市场痛点的精准对接，又通过产业链协同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三是建立权责明晰、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立健全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构建分层分类的数据交易网络，激活沉睡的数据资产价值。例如，上海数据交易所通过建设行业数据空间和确立数据分级使用规范，允许符合规定的企业调用脱敏医疗数据，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基础上，助力相关医疗器械、新型药物研发，以提供多元化的医疗消费选择。数据的合规使用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间架起桥梁，为消费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养料”。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